

# 中捷文化交流的早期使者

## 長眠在北京的捷克耶穌會士嚴嘉樂

余三樂\*

嚴嘉樂 (Charles Slaviczek, 1678 - 1735) 是清代初年來華的捷克籍耶穌會士，曾得到康熙皇帝特殊的賞識。他是出色的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音樂家和技藝高超的鐘錶師，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曾作出重要貢獻。他在北京親身見證了當時由“禮儀之爭”引發的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衝突。嚴嘉樂逝世即葬於北京的“柵欄墓地”。他祖國故鄉捷克的人民迄今仍深深地懷念着他。

嚴嘉樂是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是目前仍在北京行政學院校園內的“利瑪竇及明清以來外國傳教士墓地”保留有墓碑的三位來自捷克的傳教士之一。

嚴嘉樂 1678 年出生於捷克東部摩拉維亞的一座叫做吉姆拉莫夫 (Jimramov) 的小鎮。他的家鄉人迄今猶以他為榮。儘管他出生時的原始建築已經在二戰中消失了，人們還是在當地的一幢兩層小樓的牆上釘上了一方紀念牌，上面用捷克文寫道：

嚴嘉樂神父，耶穌會士，1678 年 12 月 24 日在吉姆拉莫夫誕生，1735 年 8 月 24 日在北京逝世，是中華帝國的數學家、天文學家、音樂家和傳教士。

捷克當代著名漢學家、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所長高馬士教授送給我一份 1995 年出版的《捷華協會通訊》，它裡面刊登了上述消息。也就是在那一年，高馬士教授編輯出版了捷克文版的嚴嘉樂書信集。該書中文版《中國來信》於 2002 年由河南大象出版社推出，捷克共和國駐華使館特為此舉行隆重的首發式。捷克大使托馬什·斯麥坦卡 (Tomáš Smetánka) 先生曾與布拉格歌劇院的 Ondrej Hrab

院長一道來到嚴嘉樂的墓碑前獻花憑弔。該歌劇院還準備排演以嚴嘉樂事蹟為題材的歌劇，可見他在捷克故鄉人民心目中的重要份量。

相比之下，在嚴嘉樂生活了近二十年最終將遺骨埋葬於斯的中國方面，人們似乎對他還相當陌生。以往的中文文獻對於他較詳細的生平事蹟披露得不多，甚至在方豪先生記述了上百名外國傳教士小傳的《中國天主教人物傳》之三卷巨著中，亦沒有嚴嘉樂的傳記。這可能是由於來華耶穌會士中有太多的巨星（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致使嚴嘉樂這顆本身也十分耀眼的明星相對地顯得有點黯淡了。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能遺忘這位中捷文化交流的早期使者。本人因此不揣冒昧，權當引玉之磚，謹以此文彌補一下時闕。

### 嚴嘉樂簡歷

嚴嘉樂的家鄉摩拉維亞的宗教事務由耶穌會掌管。嚴嘉樂在中學時期就加入了教會團體，中學畢業後於 1694 年 10 月加入耶穌會。後來他到布拉格大學攻讀哲學三年，在當地中學執教三年，又返回布拉格大學進修神學四年，於 1706 年受進鐸為教

\* 余三樂，北京行政學院副研究員，中國明史學會利瑪竇分會秘書長。

士。之後，嚴嘉樂先後在中學和大學任教多年，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但是他並沒有為自己的成就而滿足，如同當時在歐洲的很多青年耶穌會士一樣，他也渴望到海外陌生的國家去傳教。儘管有不少人申請了十多次、等待了十多年還不能如願以償，但是嚴嘉樂在1714年秋天報名後，差不多僅僅等候了一個多月，就得到了批准。這不得不歸功於他既精通科學又擅長於音樂的傑出才華。

1716年3月13日，嚴嘉樂與德國人戴進賢<sup>(1)</sup>、葡萄牙人徐懋德<sup>(2)</sup>等人一同遠航到中國。在《中國來信》所收集的嚴嘉樂寄往歐洲的第一封信，即寫給當時任耶穌會總會長的米開朗琪羅·坦布林尼神父的信中，嚴嘉樂簡述了他的行程：“1716年3月13日傍晚，我們在里斯本登上了有三十個艙位的聖安娜號。（經過五個月的艱難航程）8月30日凌晨，我們到達澳門。”<sup>(3)</sup>

1716年，中國紀年之康熙五十五年。康熙皇帝

在早年對來自遙遠西方的能給中國帶來新鮮西學的傳教士們取十分歡迎的態度，他公開邀請多一些傳教士到中國來，甚至於1692年頒旨，允許天主教像佛教、道教一樣在中國自由傳播。但是後來發生了“禮儀之爭”，1706年教皇特使多鐸來華，不顧康熙的反對強行宣佈禁止中國禮儀的教皇令。這迫使康熙皇帝改變態度，下令驅逐敵視中國禮儀的傳教士出境，禁止天主教在華自由傳播。但同時，康熙仍允許像利瑪竇那樣尊重中國禮儀風俗的傳教士（大多數為耶穌會士）留在北京居住，利用他們各種專長為宮廷服務，不干涉他們的宗教生活，對他們禮遇有加。嚴嘉樂到達中國時的情況正是如此。

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1716年9月25日）廣東巡撫楊琳奏：

本年七月十四日，有香山本澳洋舡在大西洋貿易回帆，搭載西洋人嚴嘉樂、戴進賢二



嚴嘉樂的故鄉——今日捷克地區的吉姆拉莫夫（Jimramov）

名，並西洋人書信一封。奴才隨差員傳喚，於七月三十日到省。嚴嘉樂，年三十八歲，稱會天文，並會彈琴。戴進賢，年三十六歲，稱會天文。因慕天朝聖化，於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載來粵，願進京効力。(4)

康熙皇帝於當日硃批“知道了！”——立即通知廣東總督給予盛情接待，並特派大員協同傳教士馬國賢(5)前往迎接。

在澳門，嚴嘉樂逗留了一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裡，他們為我縫製了中國衣服”，“替我剪了中式頭髮”，“我們身穿中國服裝演習中國禮儀”。(6)

“9月14日夜我們來到了中國最著名的港口廣州。”嚴嘉樂感到，“這裡的人去年就盼着我們這兩位從中歐來的傳教士了。”“第二天清早總督就召見了我們。他和藹地接待了我們。當我們告辭時，他還賜給了食品。”(7)“9月17日總督在自己的府第

設盛宴招待我們，不過席間的音樂很差。首先我得演奏羽管鍵琴給總督聽。”總督還給了嚴嘉樂等人盤纏銀兩、綢緞和添置衣服的錢，並告訴他們，9月25日將啟程赴京城。

但是，9月20日，從京城來了一位重要官員，要瞭解新來的傳教士們會些甚麼，這樣就將行期延遲了。這期間，另一名在澳門等候了一年之久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喜大教(8)也加入到嚴嘉樂、戴進賢的行列。“11月9日我們乘六艘船從廣州出發……我們的船隊經過時，每距十里的哨所，包括村鎮城市，都鳴禮炮向我們致敬。”“12月8日我們從南昌動身走陸路去北京，乘的轎子用兩匹驢子馱着；另外還有幾百匹驢子馱着行李和隨行人員。皇帝兩次派人前來催我們快走。”1717年的1月2日，嚴嘉樂一行到達北京，來到京郊的暢春園。“我們在那裡一位宮廷大臣家中住了八天，第三皇太子多次到我們這兒來詢問各種學術問題。”(9)



一幅古代捷克小鎮的圖畫



嚴嘉樂故居牆上的紀念碑



Všem našim věrným čtenářům přejeme do nového roku 1996 vše nej-  
 lepší, hodně zdraví, štěstí a pohody. *redakce*



刊登在 1995 年第 4 期《捷華協會通訊》上的嚴嘉樂紀念碑拓片

關於此事，嚴嘉樂在信中沒有詳談，我們可從《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找到一些記載。該文獻記：“近幾日已令伊等計算講解，三人仍為戴進賢略勝一籌，精於各種演算法，較現有之西洋人內似屬超群。”隨後說到嚴嘉樂，“再，通律呂之顏家樓（即嚴嘉樂），亦精通律呂，為剛抵達，語言不同，且通事皆係不通律呂者，故較從前強否之處，暫不能區分。”三皇太子還請示說：“因尚未准伊等進京城之堂，故或暫留暢春園居住以候皇父回宮。獲准伊等進伊等之堂，會見眾人之處，候父皇降旨。”康熙降旨曰：“准入堂會面。此等人尚有新好法，或有簡便計算數表、開方方法，即繕寫帶給朕。”<sup>(10)</sup>

2月3日，康熙皇帝接見了嚴嘉樂一行。對此費賴之記述說，嚴嘉樂“其人深通算數，熟練音樂，而於數種機械技藝亦頗諳練；不幸性多憂鬱，常鬱鬱寡歡。”“康熙皇帝見其能作數種樂，甚悅，面與之云：‘待一兼通曆算音律之人久矣，今得汝，朕

心甚歡。’”“嘉樂尤善彈六弦琴，帝與侍臣皆樂聞其音。尤於時計、風琴之製造與修理亦優為之，特耗長遠光陰於此。”<sup>(11)</sup>

關於康熙皇帝的接見，嚴嘉樂在他的信件中是這樣記載的：“我們行過三跪九叩的大禮之後，皇帝命我們走進他（……）跪在他寶座的小桌邊。”康熙先與他們談起關於算術和幾何的各種問題，又垂詢了音樂方面的事，嚴嘉樂還演奏了他從歐洲帶來的羽管鍵琴。“最後，皇帝表現出十分喜悅和恩寵，宣稱我的到來使他感到十分高興，他早就希望來一個好樂師，同時又是一個好數學家。由於我兼有這二者，皇帝對此高度評價和贊揚……”<sup>(12)</sup>

隨後皇帝宴請了他們。在這之後，康熙接二連三地接見他們，聽他們講數學問題。

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新皇帝基本上延續了康熙晚年的政策，一方面限制和禁止傳教士向中國人傳教；另一方面歡迎有各方面技



嚴嘉樂故居

Clarissimo, ac Doctissimo D<sup>no</sup> Theophilo Bayer,  
Imperialis Scientiarum Academiæ Petropolitanae Socio.

Cardus Slawicki minimus à minima Societate.

Unam in tres divisam Epistolam hac occasione ad nos Petinam destinasti. Vir  
Clarissime. Tanta est Eloquentia Tuae vis, ut vix tribus alveis coarctari poterit.  
nisi forsitan eo factum consilio præter, ut loco communis nihili, aliquid saltem à quo  
libet obtineres eorum, quæ ad satiandam Literature Sinicæ famem, antea expectabas  
Manum quidem, ut ais, meam agnoscis, sed quatenus, ignoro ego. Tamen gaudeas  
Epistolam illam (obscuri hujus hominis ex asse opus) Clarissimo Vestro Scientiarum  
Senatui placuisse. Nunc D<sup>no</sup> Tua Clar<sup>iss</sup> fructum forsitan majorem ex illa  
capit, quam primo aspectu colligere potuisset. Nihil in ea non lapsa ponderatum  
(quippe ad Virum tam gravem dirigenda) præter unicum sere illud additamentum  
de Literis 西字. Si Xeu quid proprie simul utrumque? difficultatis venationis, sic opus  
qua verbe, ut ingenue fateamur, in Originali meo non habebam, sed infra describendam  
adjeuram hoc nempe fuerit, quod curiositatem Tuam magis inflammavit, quam sedavit.  
Ceterum Commentaria de his literis nil aliud habent, quam Venationem illam hyperbolicam  
(Xeu) id est occidentalem (S<sup>i</sup>) appellari, quia ejus locus ad occidentalem plagam Regni  
Lu<sup>ci</sup> situs erat, hic ergo nil amplius est requirendum. Quantum ad monumentum  
Siganense, rem difficilem postulasti. Ejus explicatio Sinica, sive impressa (hujus  
exemplar alterum non habeo) adve descripta (nec tempus ad describendum modum sufficit) nihil  
prodesse potest, cum et ipsa, quod ante biennium monui, egeat explanatione. In Linguam  
nostram vertere, utcumque, quod jam olim factum, non difficile, at recte, exacte, perquam  
difficilimum, si non impossibile, quoque, ob altissimam, et fors non amplius apud Sinicam  
imitabilem Styli excellentiam, majestatem, ac profunditatem. Difficilius est, quod  
petisti. Delphici Tuus, meos videlicet observationes Librationis Lunæ. Atque in descri-  
bendis illis oporteret plus quam mensem infumere. Quid potero, hoc aliud edet, citius totius  
secretum doctrina, hactenus à nemine altero invente, prodere ante tempus? Sciat  
modo, rem perfectam esse, habeatque patientiam, dum doctrina exacte conscribatur,  
ac Luna Typus, cui complementa quadam adhuc defunt, ex omni parte Luna ipsi  
arrideat, postquam ad iterandarum observationum incudem reversatus fuerit, in aere  
suspendi. Illud mitior, unde audiveris, in sermone meo de Musica Sinica

藝的傳教士在宮廷服務。他多次將在京傳教士召進宮中，發表他對禮儀之爭和天主教的看法，也常給傳教士們一些賞賜。特別是在1725年10月，來自羅馬的使者到北京呈遞教宗的禮物和信件，雍正皇帝命全體在京傳教士也參加這一隆重的典禮。席間他還與傳教士們隨意交談，嚴嘉樂記道：“皇上轉身對我們說：‘你們是來向我問安的嗎？’我們當即叩頭稱是。皇上接着說：‘在服喪期間朕忙於無數緊迫事務，所以沒有召見你們，也沒有召見喇嘛和僧尼。今後每五天或七天你們可有幾個人來見朕。朕若有空就叫你們，沒空就不叫，那也沒關係。’”<sup>(13)</sup>皇帝還向幾位年長的傳教士如蘇霖、白晉、德理格等人詢問健康與否。

嚴嘉樂還記述，1726年10月19日和21日，“十三王爺<sup>(14)</sup>召德理格<sup>(15)</sup>先生和我進王府，在深夜令我們進他的房間，表現了對我們特殊的恩寵。他談起音樂，給我們提了許多問題，像是認真想向我們請教。但由於他國務十分繁忙，再加上這一地區防止水災問題，他這一場親切的學習、談心不得不早早結束了。”<sup>(16)</sup>

嚴嘉樂住在位於宣武門內的南堂（當時又稱葡萄牙耶穌會住院）。由於禮儀紛爭，一些傳教士被限期離京。根據嚴嘉樂信中記載，當時被允許留在北京的有：葡萄牙人蘇霖（望遠鏡專家）、奧地利人費隱（測地學家）、德國人戴進賢（任欽天監監正的天文學家）、瑞士人林濟各（鐘錶師）、意大利人羅懷中（外科醫生）、郎世甯（畫家）、利博明（雕刻專家）、法國人白晉和巴多明（翻譯家）、雷孝思和馮秉正（測地學家）、宋君榮（數學家）和安泰（外科醫生），等等。當然還有嚴嘉樂，“搞音樂的”。

不幸的是，嚴嘉樂因不適應北京的水土氣候而常年患病。他曾經不得不於1720 - 1723年間到廣州、九江、南昌等處養病。在南昌，嚴嘉樂常與在九江傳教的馬若瑟和到那裡去的宋君榮兩位法國傳教士來往。

1734年他曾在一封信中流露說，“這兒的氣候我一直難以適應”，“我多病的身體也已使我痛苦了十七年之久”。雖然他極願意寫出更多的文章，“可

是我的軀體已經整整七個月無力地臥病在床”，“如果萬能的聖明上帝另做安排，那麼一切文稿將隨我進入陰曹地府……”<sup>(17)</sup>果然，這封信就是《中國來信》中嚴嘉樂的最後一封信，第二年，即1735年8月，嚴嘉樂於北京病逝，享年57歲，在華十九年，遺體就安葬在滕公柵欄墓地。墓碑上鐫刻着以下碑文：

#### 耶穌會士嚴嘉樂之墓

嚴先生諱嘉樂，號憲侯，係大西洋波夜米亞國人，自幼貞修，于康熙五十五年欽召進京內廷供奉，卒于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七日，享壽五十七歲，在會四十一年。<sup>(18)</sup>

#### “禮儀之爭”與中西文化碰撞的見證人

明末清初的北京，由於西方傳教士的存在，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特別是由於爆發了“禮儀之爭”，在這一時期中，既有友好交流的盛事，也發生一些矛盾與碰撞。嚴嘉樂在他的書信中記錄了其中的很多細節，使我們對那段歷史有了更為深切的瞭解。

例如，嚴嘉樂在1717年3月19日的信中記述了有關“禮儀之爭”的事件。他寫道：“1716年11月初，當皇帝從滿洲回京之後，北京的副主教方濟各會的康和之<sup>(19)</sup>突然進入我們在北京的三個教堂，宣讀了教皇的諭旨。”這時正好有幾位中國官員在北堂，立即將此事稟報給皇帝。“皇帝當即下令將康和之作為重犯逮捕”。後來，康和之得到了釋放，而前提條件是“他必須將教皇諭旨的所有副本（因是秘密帶來的，所以被視為不合法）立即收集起來，自己帶到廣州去退還給那位將諭旨交給他的傳信部的教士，讓他將諭旨退還給教皇。”<sup>(20)</sup>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召在京傳教士嚴嘉樂、白晉、巴多明、戴進賢、麥大成、費隱、雷孝思、馮秉正、殷弘緒、羅懷忠等十八人到乾清宮西暖閣。嚴嘉樂親耳聆聽了康熙就中國禮儀問題所做的重要宣示。康熙皇帝說：

爾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傳道二百餘年，並無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爾等自西洋航海九萬里之遙者，情願効力，並非俘獲之人。朕因軫念遠人，俯垂矜恤，以示中華帝王不分內外，使爾等各獻其長，出入禁庭，曲賜優容致意。爾等所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爾等去留亦毫無關涉。因自鐸羅來時，誤聽教下間言，不通文理，妄誕議論。若本人略通中國文章道理，亦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識丁，如何輕論中國道義之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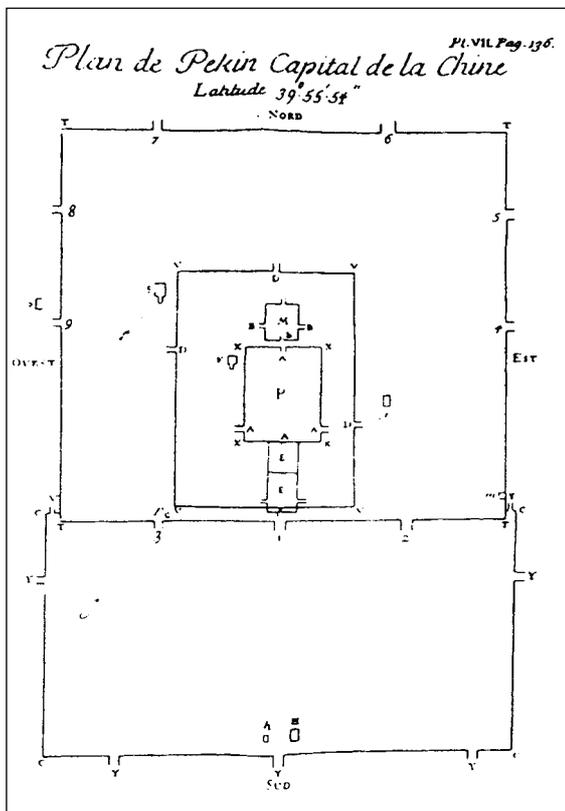
中國供神主，乃是思念父母養育。譬如幼稚物類，其母若殞，亦必呼號數日者，思其親也。況人為萬物之靈，自然誠動於中，形於外也。即爾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變，亦自哀慟。倘置之不問，即不如物類矣，又何足較量中國敬孔子乎？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使人親上死長之大道。此之聖先師之所應尊應敬也。爾西洋亦有聖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21)

1720年11月至1721年1月，羅馬教宗派出嘉樂使臣再次訪華。康熙皇帝命將其訪華活動記為《嘉樂來朝日記》，並親自用朱筆作了批改。在京傳教士中讚成“利瑪竇規矩”的十八名傳教士在文後簽名表示讚同，其中就有捷克耶穌會士嚴嘉樂。

《嘉樂來朝日記》再一次宣示了康熙皇帝對禮儀之爭的明確態度——

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戾。而天主教在中國行不得，務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國之西洋人亦屬無用，除會技藝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餘在中國傳教之人，爾俱帶回西洋去。且爾教王條約，止可禁止爾西洋人，中國人非爾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教王條約自行修道，不許傳教。

爾欲議論中國道理，必須深通中國文理，讀盡中國詩書，方可辯論。朕不識西洋文字，所以西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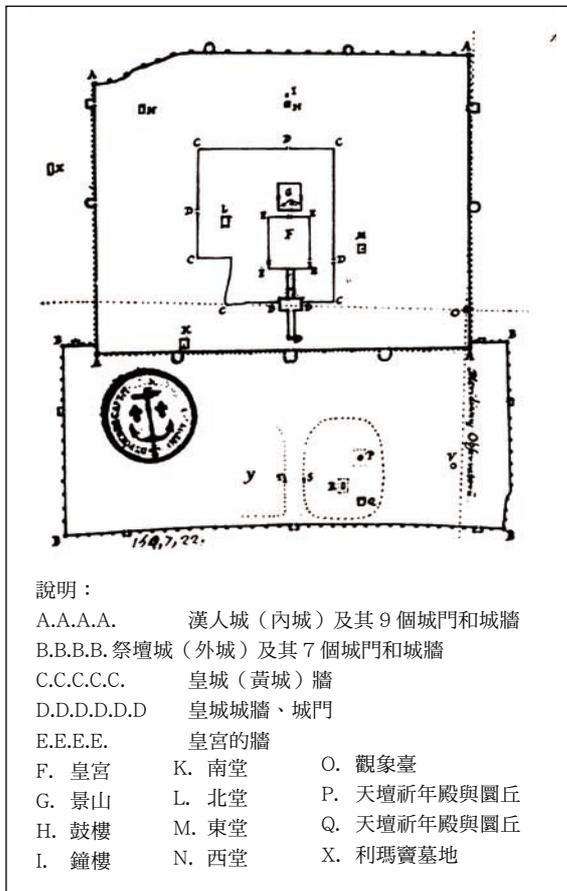
發表於1729年巴黎出版的蘇西埃編著的《觀測報告》第一卷中誤差較大的北京城平面圖

之事，朕皆不論。即如利瑪竇以來在中國傳教，有何不合爾教之處？在中國傳教之眾西洋人，如有悖爾教之處，爾當帶回西洋，照爾教例處分。

覽此條約，祇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不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2)

雍正皇帝即位後，多次在京傳教士宣示他的宗教政策和對“禮儀之爭”的態度。嚴嘉樂亦在場親耳聆聽，並用筆記錄了這些重要的歷史事件。

1723年4月14日，皇十三子“以皇帝的名義將蘇霖、費隱、馮秉正神父及俗家修士郎世甯召進宮”，勸他們“根據自己的信仰安靜地生活，宣傳自



嚴嘉樂親筆繪製的北京平面圖作為他  
1731年9月22日致什·蘇西埃函附件

己的信仰，不要管別人的事……此後，新皇帝通過這位皇子告知郎世寧，讓他畫幾幅畫。皇帝陛下很喜歡他的藝術作品，常賜給他特別豐厚的禮物。”<sup>(23)</sup>但同時嚴嘉樂也悲哀地歎息道：“真想不到基督教竟淪落到這種地步，祇有靠耶穌會一名教士的畫筆才能救他。（……）在福建省受迫害的既有多明我會士，也有耶穌會士，整個基督教都受迫害，教堂變成了異教徒的學校。”<sup>(24)</sup>

1725年4月29日，雍正皇帝把任欽天監監正的戴進賢召進宮，問他授予他朝廷的官職時，教會方面是否加以阻撓？當時戴進賢任監正，但是沒有品級。這就發生了問題，在欽天監編輯的曆書上應署上所有參與其事的人的名字，其他的人都是有品級的。如果作為監正的戴進賢沒有品級，名字就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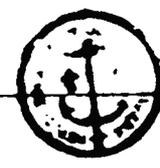
署在別人之前；但如果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後，又與其監正的職務不相稱。“而且，欽天監監正每年有幾次上朝；另外一些隆重的場合也會與其他大臣們一起出現，別人都穿着有品級的朝服，唯獨監正一人與眾不同，這樣也不妥。”對此，戴進賢回答道：“對陛下的意願無人反對。”<sup>(25)</sup>於是，他被授予官居二品的禮部侍郎。

同年的10月24日，雍正皇帝在服喪期滿後召集在宮廷服務的所有傳教士（共21人，其中耶穌會士17人）到圓明園。皇帝問候了幾位老者，並賜奶茶，然後他談起了宗教信仰問題。他說：“你們是中國的客人，是來宣揚上帝的《聖經》的；同樣，喇嘛、佛家僧尼還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國的客人。”他說，“每個大帝國都有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書。中國有自己的經書——儒學。滿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歐洲人都有自己的經書。”他說，各國的經書都是好的，因為每一種經書都認為必須為善並教會別人為善。“但是，如若要將各種宗教信仰加以比較的話”，皇帝說，“哪種宗教能與中國文人的學說——儒學相提並論呢？”雍正皇帝還說：“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標都是同樣的，是多位一體的。天、佛、天主，還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種宗教去反對另一種宗教，這有違常理。……你們欺侮佛教徒，反對他們；他們反過來又一報還一報，攻擊你們的《聖經》。雖則每一種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他們的信徒中間總有壞人，這些人違反教義和教規。對這些壞人必須加以處置……”<sup>(26)</sup>

在上述雍正皇帝接見教皇使者的典禮上，雍正也談到這一話題。嚴嘉樂在場聆聽，並作了如下記錄——

當皇上問明在中國的傳教士一共祇有四十人左右時，說：“他們人這樣少，我們國家這樣大，分到每個省份中有兩三個人，更不用說他們還不懂中國話。還有，如果信奉你們宗教的我國臣民違反了我國的法律，你們將怎樣懲處他們？你們手上又沒有權力。難道你們想要朕授予你們懲處朕的臣民的權力嗎？朕允許你

De Luna & Eclipsibus, quae in Libro Classico, dicto Ichuan Tricoe annotantur.

Anno			Lat.	Long.	Mag.	66. Ecliptica ad Meridiana	Lat.	Crisis	
三年	二月	巳巳	720	4	3	丁丑	Febr. 22. ante med. l. s. 16	Bpr. 31. 45	
三年	七月	壬辰	709	15	8	甲戌	Jul. 17. p. mer. Eclips. prima. tota.	Bpr. 30. 47	
十七年	十月		695	10	11	戊子	Octob. 10. v. m.	B. 36. 31	
十八年	三月		676	10	5	戊辰	Apr. 15. ante med. noct. Octob. 10. post med. m.	Bpr. 5. 40 A. 0. 60	Ipus. Sinus novae Eclips. totalis
二十三年	六月	辛未	669	17	7	甲辰	17. d. Dec. praed. D. h. 1. 1. 22. 30+	B. 10. 00	
二十六年	十二月	癸亥	668	18	12	庚戌	17. d. Dec. praed. D. h. 1. 19. 20. 3.	B. 42. 00	
三十年	九月	庚午	664	3	10	辛未	17. d. Dec. praed. D. h. 1. 5. 20. 4-	Bpr. 43. 00	
三十五年	九月	戊申	655	12	9	戊午	17. d. Dec. praed. D. h. 1. 26. 6. 12+	B. 36. 00	
三十八年	三月	庚午	648	19	5	乙未	17. d. Dec. praed. D. h. 1. 8. 21. 28+	B. 42. 00	
四十二年	五月		645	3	4	庚戌	17. d. Dec. praed. D. h. 1. 6. 12. 36-	Bpr. 1. 22. 00 Apr. 3. 35. 00	Nulla visibilis
四十五年	二月	癸亥	626	3	3	庚寅	17. d. Dec. praed. D. h. 1. 6. 5. 8-	B. 36. 00	
四十八年	六月	辛丑	612	17	6	甲辰	17. d. Dec. praed. D. h. 1. 1. 0. 6+	B. 50. 00	
五十二年	七月	甲子	601	9	10	辛丑	17. d. Dec. praed. D. h. 1. 0. 3. 59+	B. 45. 00	En Luna Eclipsus nona. Deinde tota probatur et nona. Eclips. prima. tota. 7. septem. pro. 4. decima.
五十七年	四月	丙辰	599	11	4	壬子	17. d. Dec. praed. D. h. 1. 7. 10. 20+	B. 50. 00	
六十年	六月	癸卯	592	18	5	己丑	17. d. Dec. praed. D. h. 1. 19. 14. 13-	A. 32. 00	En Luna dai. ha. unica. En mali. praed. con. April. 17. Junius. 7. Kai.
六十四年	六月	丙寅	575	16	6	戊午	17. d. Dec. praed. D. h. 1. 28. 2. 23+	B. 15. 00	
六十七年	十二月	丁巳	574	17	11	癸亥	17. d. Dec. praed. D. h. 1. 9. 12+	B. 36. 00	En Luna dai. ha. unica. En mali. praed. con. April. 17. Junius. 7. Kai.

們在宮廷和廣州居住就夠了，對你們也安全一些。朕知道，你們的意圖是使全中國都信奉你們的教。既然如此，你們何不先讓整個宮廷和全廣州市都變成信奉基督教的呢？到那時想叫全中國都信基督教就不大費事了。你們可以讓那些信基督教的北京人、廣州人去辦，比你們自己去辦容易得多。此外你們還說，你們的教和我國的儒教沒有多大區別。果真如此，你們又何必把你們的教強加於我們呢？如果兩者還是有區別，那麼你們應該知道，我們是不會為了你們的宗教而放棄有幾千年歷史的儒學的。(27)

嚴嘉樂記錄的這些話，清楚地體現了雍正皇帝的宗教觀。可貴的是，這些資料都是《清實錄》中沒有記載的，因此對我們研究當時的宗教史和禮儀之爭堪稱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嚴嘉樂在他的後半生，即從1716年至1735年的十九年間，見證了由於“禮儀之爭”而在中國特別是在中國教會中造成的種種矛盾與紛爭。很多在華耶穌會士在教宗的諭旨和在華的傳教事業之間的兩難選擇中，痛苦地掙扎，有的甚至為此而英年早逝。但嚴嘉樂在面對現實時，心情似乎沒有這麼沉重。他曾說：因為“要想執行教皇諭旨而又不致使我們整個傳教事業冒完全毀滅的巨大風險是不可能的。皇帝已再次聲明：如果要禁止中國禮儀，他就不能容忍歐洲人留在中國；他命令德理格寫信給教皇告知此事。”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對教皇的諭旨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嚴嘉樂說，“我們修會的神父們是怎麼做的呢？他們當然恭順地接受了教皇的諭旨，作了相應的宣誓，但他們決定暫不實行。”(28)

此外，嚴嘉樂也對早期開創天主教在華“適應策略”的利瑪竇等人充滿了深深的敬意。他嚴厲地駁斥了那些遠離中國的某些教會人士對利瑪竇等人的攻擊。他說：他們“居然貶低利瑪竇、湯若望以及他們在天文學論壇上的繼承人，說他們不是以數學為職業的，他們在歐洲也沒有什麼名氣……”嚴嘉樂稱這種“可以不顧一個最光榮最古老也是幅員最遼闊的國家的聲譽”，並且肆意糟踏利瑪竇等耶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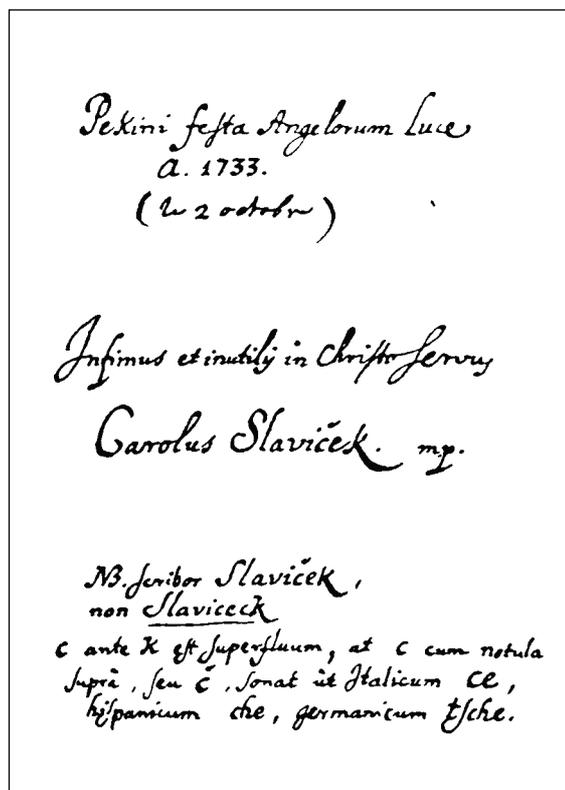
會士的名聲和功績的人為“中了邪的人”。他說：“今天中國天文學，經過耶穌會的神父改造之後，已經如此完美”，而“那些能夠使中國人的天文表格改進得如此完善的人，必然是真正傑出的天文學家，雖則這些人是耶穌會士，雖則這些傳教士在歐洲某些科學院是不知名的。”(29)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嚴嘉樂是從內心裡讚成“利瑪竇規矩”和“文化適應”策略的。

### 在諸多學術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巨匠

由於嚴嘉樂廣博的知識和多方面的技能，在當時的宮廷中，他既是天文學家，又是音樂家，同時又兼任地理學家和鐘錶師。

天文學家嚴嘉樂。他從中國古代典籍《春秋》一書中找到了三十六次有關日食的記載。他認為“這些日食的記載大部分是正確的，祇有少數幾次有



嚴嘉樂手迹，摘自1733年10月2日致什·蘇西埃函

◀ 嚴嘉樂1730年12月18日致蘇西埃信函所附〈古籍《春秋》中記載的三十六次日食一覽表及其訂正〉原件（局部）

誤差。這是抄寫者的筆誤還是《春秋》的作者孔子的錯？這很難確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最近的幾次日食的記載是比較準確的，因為當時還在世並且已較為成熟的孔子親身經歷過；第二，評論家們並沒有忽略這些誤差，而且承認有部分誤差，為部分誤差道歉過。”<sup>(30)</sup> 嚴嘉樂編製了《春秋》中記載的三十六次日食一覽表及其訂正的文本。這一寶貴的文獻經翻譯者的翻譯整理，已被收進《中國來信》第100-105頁中。

嚴嘉樂也熱衷於實際的天文觀測。他在一封信中談到，他在北京的三座教堂裡分別用19尺和30尺的圭表測量北極星的高度（即北京的緯度）。他得到的結果是 $39^{\circ}54'18''$ 、 $39^{\circ}55'33''$ 和 $39^{\circ}55'18''$ 。<sup>(31)</sup> 他所測量的北京與巴黎的子午線差距為“7小時34分30秒”。<sup>(32)</sup> 嚴嘉樂在寫於1732年11月6日的一封信中稱：“現在佔用我大部分時間、精力的是經常觀察月球天平動。”所謂月球天平動，是指月球圍繞地球旋轉時出現的週期性偏差。嚴嘉樂稱：“這種觀測包含許多有用的東西。”即：“第一，月球的可見直徑；第二，月球可見中心位置和其距任何一個可見斑點的距離；第三，繼續觀察就可以發現月球可見中心的移動，從而揭露月球天平動的根源；第四，月球運行軌道的偏心律的增大或減小。”他還說：“為此必須使用有特殊結構的望遠鏡。觀測的精確性要求觀測者十分熟練，而熟練往往是從長時期的實踐經驗中產生的。”<sup>(33)</sup> 嚴嘉樂有關天文學的著作有：《天文測驗》（與戴進賢合著）、《月食測驗》、《推算表》、《測北極出地簡法》和《月動測驗》。<sup>(34)</sup>

地理學家嚴嘉樂。嚴嘉樂對繪製地圖素有訓練。早在未到中國之前，他就繪製過布拉格市的地圖。到北京之後，他分別於1718年和1727年兩次繪製北京城的地圖。1731年嚴嘉樂收到他在巴黎的同事寄來的《觀測報告》一書，其中刊載了一幅誤差很大的北京地圖，於是嚴嘉樂就將自己測繪的北京地圖以及若干說明一同寄去巴黎。這幅圖寬34釐米、長39.5釐米，現保存在巴黎天文臺圖書館。從圖中可以看出，繪製者對內城、外城、皇城及紫禁城都

作了精確的測量，並標出一些標誌性建築（景山、鼓樓、鐘樓、南堂、北堂、東堂、觀象臺、天壇、先農壇及利瑪竇墓地等）的準確位置。為了繪製此圖，嚴嘉樂“走遍了所有的城牆”<sup>(35)</sup>。從嚴嘉樂繪製的北京地圖，外國科學家發現，“分隔滿人城和漢人城的大城牆，這道城牆幾乎是同赤道平行的，而通過皇宮的院子和宮殿、指向有大鐘的鐘樓的中軸線則精確地與這道城牆垂直，祇在其北段略向西偏斜。由此我認為，中國人本來的意圖可能是按照世界的方位來設計這條中軸線的，至於那細微的偏差，則可能是工作的精確度不夠或當時使用的羅盤有毛病，使這條線偏離了子午線。”<sup>(36)</sup>

鐘錶師嚴嘉樂。“1726年2月26日，一位尊貴的大臣給我送來一座英國造的時鐘，懇求我盡可能將它修好。這座鐘在運輸途中給糟踏得不像樣子。……這可是一件挺費勁的細活，開頭我還不願幹它，可是順利地修好它之後我感到十分高興。我甚至想，這是上帝聖明，讓我先拆開修理大臣的一座鐘，這樣我就有能力去順利修理屬於皇帝的、遭到類似損壞的自鳴鐘了。”<sup>(37)</sup> 果然後來他就碰到了這樣的機會，1727年“10月27日我又奉命進宮，修理別人送給皇帝的自鳴鐘。這座鐘同上面我說的時鐘一樣，能演奏十二支曲子。這是一座十分精美的機器，拿來向偉大的帝王進貢是再合適不過了。”11月19日，嚴嘉樂再次進宮“修理皇帝的另一座自鳴鐘，是能演奏九支曲子的。這座鐘同我上面談到



本文作者（右一）帶領捷克駐華大使托馬什·斯麥坦卡（左一）和布拉格歌劇院院長（右二）等參觀北京柵欄墓地

的鐘是出於同一位著名的鐘錶大師平奇貝克<sup>(38)</sup>之手。修理這兩座鐘在這幾個月裡費了我很多時間。”<sup>(39)</sup>

音樂家嚴嘉樂。嚴嘉樂不僅是出色的音樂演奏家，同時對中國音樂理論有研究。書中的注釋指出：嚴嘉樂的音樂才能來自於他家族的天賦。<sup>(40)</sup>在他的一位同事從聖彼德堡給他的致函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聽說，尊貴的先生，在您的抽屜裡還存放着您自己編寫的、關於中國音樂的更加精彩的著作。您可千萬不能把自己付出巨大努力、以透徹敏銳的眼光研究出來的成果束之高閣，向您的歐洲保密喇！”對此嚴嘉樂回答說：“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從哪裡得知我的抽屜裡還存放着我親自撰寫的關於中國音樂的材料？我肯定有關於音樂的中文書，我內心對中國音樂十分珍愛……”<sup>(41)</sup>“我有些關於數學、音樂和聲等的論文，那是前些年我為先帝服務時常常在研究中想到的，我有意將它們加注並釐清。”<sup>(42)</sup>他說他如果能夠回到故鄉捷克，他“會拿出大量的文稿讓布拉格的印刷廠應接不暇”。他的同事在回信中高興地說，“到了那時我馬上跑來找您，向您學唱中國歌，您看如何？”在費賴之的書中提到嚴嘉樂著有“《論中國音樂》寫本數件”。

### 溝通中歐科學交流的傑出信使

當時在京的耶穌會士與歐洲的書信往來頻繁，特別是法國教士，將中國的科學及科學史資訊以通信的形式傳播到歐洲各主要科學機構。如法國耶穌會士宋君榮，曾先後被選為巴黎科學院、巴黎考古研究院通訊員，後又被俄國聖彼得堡帝國研究院和倫敦研究院聘為研究員。當然，他不過是諸多與歐洲科學機構交換情報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嚴嘉樂也是與歐洲科學機構保持通訊的在京傳教士之一。他的學術著作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同巴黎和聖彼德堡著名天文學家的學術通信。現存的僅僅是他實際通信的一小部分，其中有：1730 - 1733 年間寫給法國天文學家、耶穌會士什傑潘·蘇西埃的五封信；1732 - 1735 年間同聖彼德堡兩位學者——漢學家托菲爾·西格弗里德·拜爾和天



捷克駐華大使托馬什·斯麥坦卡在嚴嘉樂墓碑前拍照

文學家約瑟夫·尼古拉·德里斯爾之間的七封信。<sup>(43)</sup>高馬士先生指出，這些信件“包含一系列學術命題、計算、圖表、概述和論戰，其範圍相當廣泛，對於歐洲人認識中國科學、尤其是數學和天文學的歷史具有重大的價值。”同時，這些信件也是當時歐洲學術界對中國科學的發展和現狀具有巨大興趣的有力證明。

上述嚴嘉樂對中國歷史上日食紀錄的統計和論證，以及關於北京城地圖的繪製，等等，都是記錄在給法國天文學家、耶穌會士什傑潘·蘇西埃以及寫給聖彼德堡的兩位學者——漢學家托菲爾·西格弗里德·拜爾和天文學家約瑟夫·尼古拉·德里斯爾的信件中的。

1732 年，嚴嘉樂等人向俄國寄送了“當今皇帝在位十一年的皇曆、中國星象圖”以及一些關於中國音樂的書籍和資料等。

同時嚴嘉樂也從歐洲得到了最新的科學情報刊物——出版於巴黎的《觀測報告》。他從閱讀來自歐洲最高層次的科學家——什傑潘·蘇西埃的來信中獲得了“巨大的快樂”。他說：“您（蘇西埃）對我的上兩封信的回信給我的心帶來了巨大的快樂，因為這是我收到您寫的第一封信；這封信是出自這樣一位全世界學術界公認的巨匠之手，使我快樂倍增；而您的回信對我奉上的微薄禮物的贊許遠遠超出了我的期望，這使我快樂到了極點。”<sup>(44)</sup>此外，他還收到來自俄國的有關科學情報的刊物《沙皇科學院

評論》、《柏林醫學論文集》、《宇宙總結構學》等科學雜誌與論著。

無疑，這些有關中歐科學情報和學術著作的交流，是當時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方面使世界瞭解了中國各個方面特別是有關科學研究的真實情況，也使中國與世界科學的前沿陣地保持了經常的聯繫，以便能及時地得到最新的科技情報。而嚴嘉樂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傑出的貢獻。

嚴嘉樂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九年的時間裡，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如此之多的貢獻，是與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崇敬的態度密不可分的。這一點在他的信件中也有充份的體現。他在批評一位法國神學家及東方學家埃塞布·雷諾多歪曲和詆毀中國的言論時說：

祇有愚昧無知的人才會詆譏中華民族，這樣做的人通常都是心懷妒忌，他們不希望別人成功，巴不得人家一無是處，他們心裡就美滋滋的。(45)

在幾千年前，歐洲還是蠻荒落後的地區，而中華民族當時已是世界上最有知識的民族，中國至今仍然比世界其它地方更加文明。(46)

早在公元前兩千幾百年前，中國的數學對天象和四季的知識已成熟到這樣的程度：一旦發現天象變化與天文預測不符，欽天監就要掉腦袋。誠然，在晚一些的時候中國人在天文學有些方面不如過去完善了（這他們自己也承認，某幾次誤差也證實了這一點），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說，古老的日、月食記載不可靠，更不能否定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文化。(47)

嚴嘉樂在給一位法國同事的信中說：

我雖然不是 gallus〔拉丁文，詞義是‘公雞’，另一詞義是‘法國人’〕，但我至少是 philomela〔拉丁文，詞義為‘夜鶯’〕，因為我的捷克名字 Slavíček 譯過來就是夜鶯。(48)

他的那位同事稱：“至今聽到的任何夜鶯的歌都沒有嚴嘉樂寫的內容充實的信件美妙動聽。您教會人們，用光輝而有益的指示啟迪和美化人們的心智。但願這樣的夜鶯常常飛來。”(49)

讓這位曾經溝通了中西歷史上文化交流的“夜鶯”，永遠活在中國和捷克兩國人民的心中。

### 【註】

- (1) 戴進賢 (Ignatius Kogler, 1680 - 1746) 德國籍耶穌會士，天文學家。
- (2) 徐懋德 (Andrew Jackson, 1690 - 1743) 英籍葡萄牙人，天文學家，1716年來華。
- (3) (捷克) 嚴嘉樂著、高馬士編輯、叢林、李梅譯《中國來信》，大象出版社2002年出版，頁16-17。
- (4) 《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七冊。
- (5) 馬國賢 (Mateus Ripa, 1682 - 1747) 意大利籍傳教士，畫家，1710年來華。
- (6) (7) (9) (12) (13) (16) (17) (20)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3) (35) (36) (37) (39) (40) (41) (42) (44) (45) (46) (47) (48) (49) 《中國來信》：頁17；頁18；頁31；頁32；頁48；頁59；頁130；頁33；頁41；頁42；頁47；頁49；頁53；頁33；頁93；頁90；頁112；頁115；頁138；頁140；頁56；頁59、60；頁157；頁130；頁98；頁116；頁86；頁90；頁92；頁99；頁74。
- (8) 喜大教 (Nicolas Giampramo, ? - 1750) 意大利籍耶穌會士，1716年來華。
- (10) 引自羅蘭桂《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有關西洋傳教士及澳門史料輯錄》，見澳門《文化雜誌》第三十八期，頁142。
- (11)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頁669-670。
- (14) 雍正皇帝的十三弟，他當政時的主要助手。
- (15) 德理格，意大利遣使會傳教士，音樂家。
- (18) 高智瑜、林華、余三樂編《歷史遺痕》，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頁23。
- (19) 康和之，意大利籍方濟各會士，強烈反對中國禮儀。
- (21) (22) 中國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2003年出版，第一冊：頁35；頁36-47。
- (32) 如今北京的經緯度確定為東經116°20'，北緯39°50'，而巴黎的經度為東經2°20'，1小時時差為經度15°。
- (34)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670。
- (38) 平奇貝克，18世紀英國著名的鐘錶師。
- (43)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頁690。